

困学居思想文化札记初编

王列生 著

困学居

王列生 著

困学居思想文化札记初编

困学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学居思想文化札记初编/王列生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106 - 03502 - 0

I. ①困… II. ①王…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9075 号

责任编辑: 任苾达

封面设计: 尚书堂

版式设计: 果 果

责任校对: 孙 建

责任印制: 张玉民

困学居思想文化札记初编

王列生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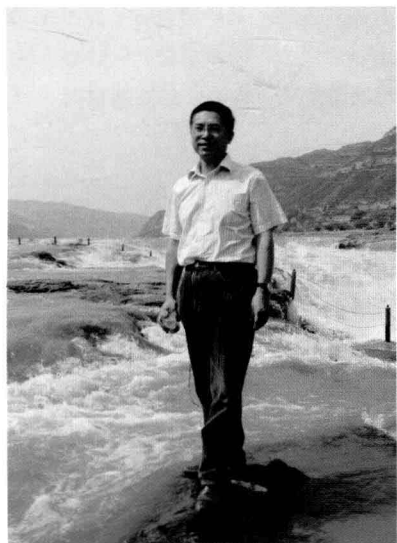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7.75 插页/2 字数/21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502 - 0/C · 0021

定 价 56.00 元



二〇一二，作者于壶口瀑布留影

作为文化意象的伊尹及其意义播撒——先秦思想文化札记之一

论自由知识制度及其诸子百家的兴起——先秦思想文化札记之二

古典民本主义的立场分异与价值认同——先秦思想文化札记之三

论“孔子适齐”的事态义旨与道穷——先秦思想文化札记之四

目录

—

作为文化意象的伊尹及其意义播撒——先秦思想文化札记之一 / 001	
论自由知识制度及其诸子百家的兴起——先秦思想文化札记之二 / 041	
古典民本主义的立场分异与价值认同——先秦思想文化札记之三 / 070	
论“孔子适齐”的事态义旨与道穷——先秦思想文化札记之四 / 102	

二

艺术物化与艺术批评“被物化” / 119	
“设计”的形而上追问 / 138	
消费逻辑在城市电视生存中的命题真值 / 160	
论电视视觉叙事中的语用嵌位 / 178	
主体缺席的概念晚餐——关于当代文学批评失态的一种分析 / 192	
“互阐指令系统”与比较神话学 / 205	

三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 / 217	
和谐文化观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 221	
站在时代高度看文化发展 / 225	
文化财政政策研究的命题取向 / 230	
公共支付条件下县域博物馆业务预算探讨 / 241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配置、工具功能化及其财政杠杆 / 251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困境 / 261	

后记 / 265

作为文化意象的伊尹及其意义播撒

——先秦思想文化札记之一

伊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贤相,不仅杰出于商王朝的成汤时代,而且丰碑于中国全部封建王朝史,其“因贤致圣”之功,不仅受到成汤“聿求元圣,与之戮力”^①的高看,而且被儒家的偶像孔子以极高的道德推崇,并获亚圣孟子给予圣称的崇高评价^②。至于自古及今以伊尹为修德事功楷模者,无论居官还是为学,堪称其数不胜数,其言不可胜举,故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虽旨在罗列涉及商一朝大事,却不惜以渲染的笔调称其“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③。孔颖达《尚书正义》中所存伊尹之《伊训》、《咸有一德》与《太甲》三篇,以及称其亡佚之作的《肆命》、《徂后》等,虽然长期困受汉以来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知识诉讼游戏的纷扰,极限情况则更煎熬于真伪稽查的炙烤,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经学知识文化而言却仍然具有典范性知

① 虽然《论语·季氏》有“陈力就列”之说隐证此事,而《孟子·万章上》所议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训己也”亦可具伊尹于汤及嗣王的不可或缺意义,但后世儒者有于古今经文阐释学知识的游戏快感,导致《汤诰》沦至伪古文名单,此一事态的知识信任也就随之大打折扣。

② 参见《论语·颜渊》:“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

识坐标意义。正因为如此,这位继二十二贤传说之后、先孔子数百年之前的中华文化英雄,在经历汉儒策划的民族精神囚禁事件及孔孟的无限偶像之欢之后,就变得极具民族精神文化真相重审的个案价值和符号象征意义。

但问题是,虽然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某些专家,对毫殷之事甚或陶唐之事的时间、地点、人物言之确确、论之凿凿,且《尚书》在春秋以前的诸多文献中广为征引,包括伊尹在内的诸多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在《诗》、《易》、《礼》、《春秋》三传,乃至《竹书纪年》、《逸周书》、《国语》以及《老子》、《墨子》、《管子》、《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荀子》等先秦经典文本中多有议及,但我们仍然以历史实证科学的严密逻辑约束自己言说的合法性,并且愿意与疑古派学者们互约某些基础性共同前提,从而最大限度提高我们此议的命题准入条件。因其如此,在讨论“作为文化意象存在的伊尹”之际,所采取的方法就是“衍生性事实还原”而非“原生性事实还原”^①,而其追求的知识目标,就是对影响更深而且事态波及更广的思想文化事实予以真相揭弊,并且这一知识行动的逻辑前提就是历史地完成形象塑造的上古文化事实而非局限于伊尹的个体性时空定位,尽管后者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必然与前者构成紧张冲突关系。

① “衍生性事实还原”与“原生性事实还原”具有方法递进意义,其共同点在于对“事实”的历史尊重,其分异点则在于微观事实取向与宏观事实取向,情形恰如《君奭》考论“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八“咸有一德”疏引),以及《诗》毛传所议“阿衡,伊尹也”,或者郑玄所谓“阿,倚;衡,平也。伊尹,汤倚而取平,故以为官名也”,都是必不可少的原生态事实还原,而“衍生性事实还原”所强调的是,不管这个伊尹真相如何,问题是他究竟在历史引领位置扮演什么样的文化形象,这一形象以哪些价值义项及何种方式影响着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也就是揭示影响的事实态与价值态。

虽然我们的出发点在于对伊尹文化意象的总体捕捉,然而尽可能精确准确地求证其本人本事,却无疑具有极大的前提意义。

最早见于记载的文字,除《尚书》中伊尹所作诸篇外,还可见同一文本中时序稍后的,如《商书·说命下》之“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①,以及《诗·商颂·长发》中“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此类记载文字,都在传说中的孔子文献纂整事件以前,所以虽不若安阳出土甲骨确证武丁或盘庚那样具有铁证如山的考古学意义,然而要想推翻其人其事的具指真实性,已然提供了不可推翻的文献论据。

自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不乏演绎的身份描述之后,无论是古文学家还是今文学家,都从各自的知识立场出发,对伊尹的身份具指给予或详或略的定位。诸如清马骕纂《绎史·伊尹辅太甲》引《帝王世纪》之“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余岁。大雾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礼,祀以大牢,亲自临丧,三年,以报大德”,宋郑樵《通志》卷三《三王纪》之“伊尹,处士也。名挚,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以币聘之,五反,然后往见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或言伊尹为有莘氏之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汤举伊尹,任以国政。伊尹乃进,君国子民之人皆在王官。汤以伊尹为贤相,而荐于桀,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十二引《说苑》之“汤欲伐桀,伊尹请且乏贡职,以观夏勋。桀怒,起九夷之师。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

^①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九疏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传曰:“伊尹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

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请服,入贡职。明年,又乏贡职。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桀。残之,迁于南巢”,唐林宝《元和姓纂》卷三《释伊》之“帝尧伊祁氏之允。裔孙伊尹,名挚,相汤,生陟奋”^①,以及《皇览》所谓“伊尹冢在济阴己氏平利乡,近于亳”等,往往从某一角度作逼近本人本事的识别。

由于今文经学家们大多否认《尚书》文本中存在过具有真实原典品格的《伊训》、《咸有一德》、《太甲》三篇,而古文经学家相信存在过《肆命》、《祖后》,就像咎单的《明居》或河亶甲的《河亶甲》一样,连他们自己也在亡佚之灾中失去求证的机会,所以也就必然会在一系列的叙事逻辑不周中遭遇真实性和完整性等方面的质疑,并且这些质疑往往被一言以蔽之于诸如晚清言论的“古文肇出鲁壁,不列学官,盛于新莽,微于中兴。厥后杜、卫、贾、马赓续倡和,若故为今文树之敌者,而且从来亦远矣”^②。更何况《古本竹书纪年》之“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分之”,大悖于《今本竹书纪年》的“十七年,商使伊尹来朝。二十年,伊尹归于商及汝鸠、汝方,会于北门”,在进一步确证本人真实性的同时,又平添了更多本事的复杂性,从而就为今文学家以及一切“孔子乃中国思想文化史第一圣贤”持论者以附加的口实。

问题在于,伊尹之被尊为“圣”、“贤”并且排序于孔子之前,乃孟子首创,而《孟子·告子下》明示“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与同处战国时代纵横家之鬼谷子所谓“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

① 此后伊氏记载则有如《风俗通》的“汉有议郎伊推。又伊喜嘉为雁门都尉,石显党也”,《三国志·蜀志》的“伊籍,山阳人。今右仆射、安广节度伊慎,广州人”。

② (清)王先谦:《今文尚书考证序》,引自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

三入股,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①,恰有语源同向的上古文献意义。故而后世即使有翟灏《考异》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曰:‘孟子称伊尹五就桀,盖屡言之,以明圣人去就不常,非定以为五也’。胡氏谓无五就之事,而古凡频率之辞,云三者多,云五未别见也”^②,亦皆缺乏起码的语义颠覆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儒学中兴栋梁的朱熹,就不仅全盘接受孟子陈述的事实,而且更进一步发掘出:“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杨氏曰:‘伊尹之就汤,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汤进之也。汤岂有伐桀之意哉?其进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过迁善而已。伊尹既就汤,则以汤之心为心矣;及其终也,人归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汤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为心也。以取天下为心,岂圣人之心哉?’”^③。

因此,对于伊尹的生平事迹,我们完全可以超越今古之争所带来的诸多争执,而基本取信于司马迁采众说荟集而来的(一)“伊尹名阿衡”,(二)“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三)“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四)“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五)“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六)“作《汝鸠》、《汝方》”,“作《咸有一德》”,“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乃作《太甲训》三篇”^④,尽管这一切都还有待未来考古

① 见《鬼谷子·杵合》。按鬼谷子无姓名谥号,战国时隐居颍川阳城之鬼谷,因以自号。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师之,受捭阖之术十三章。

② (清)翟灏:《四书考异》

③ (宋)朱熹《宋书章句集注》卷十二《孟子集注》。朱子所云杨氏,则龟山学派掌门杨时,引文或见其所著《三经义辩》。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十五称其“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

④ 所引均见于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学发掘的更多实物证据的支撑。至于今文学家们对这些所提出的一系列合理性诟病,则由于此议重心已经乾坤挪移,从而也就获得对这些纠缠的合理规避。

二

伊尹之所以能够偕同位列“五帝”的成汤一起,成为自先秦以来我们这个民族辉煌而且不灭的记忆,不在于成汤般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①,而在于“汤—伊”组合不可或缺的“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②,以及历史衍生过程中逐渐完善并全面影响先秦思想文化进程的意象符号。

很显然,这一意象符号的文化功能实现,在于其能够突破战国以后学派知识边界而获得元意义的普适推崇地位,尤其是能够突破儒家意识形态立场的限宥,这对于《尚书》作为儒家经典所给予的符号承载而言,几乎就是一个奇迹。从先秦的文献中,这一普适性文化符号奇迹,是包括老子、墨子、孔子在内的任何一位那一时代站立起来的宗师都无可比拟的。管仲崇拜其“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③,尸佼称道其“汤举伊尹于雍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仁者之于善者也,无择也,无恶也,唯善之所在”^④,韩非子感动其“上古

① 《诗·商颂·玄鸟》

② 《韩非子·南面》

③ 《管子·轻重甲》

④ 《尸子·仁意》

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以智说愚，必不听，文王说纣是也”^①。凡此种种，虽然各家师承渊源并叙议取向相去殊远，然而伊尹对于他们的肯定性文化价值辐射，却是相似乃尔。

对于这样的肯定性文化价值辐射，其发生轨迹一定呈现为历史渐开的线性过程，而且其知识载体也未必就一定局限于《尚书》。既然作为文化意象的伊尹及其相应的本人本事，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成为普适而且普议的价值肯定对象，甚至是导向性公开标杆，那么即使所谓伪《尚书》本文具有一定的否定性猜疑条件，也仍然不足以怀疑伊尹符号及其文化影响的真实性与深刻性，除非所有指涉伊尹的先秦诸子及其存留文本是一个极大时间尺度和极大空间尺度的集体作伪现场。恰恰相反，一旦至于作伪事态，则时空逻辑反而会给作伪者以强大的压迫力量，促使其被动性退却，与此最有关联的案例是，考据家们几乎一致指证并托名周列御寇的《列子》，其《汤问》篇堆砌了几近万言，从“殷汤问于夏革”拉扯至“周穆王大征西戎”，不仅其涉汤细节远远少于春秋以后的世事人情，而且于伊尹其人其事其文只字未及，这不仅会令关心殷商真相的今人在阅读之际非常失望，而且也一定会使最早接触这一文本涉伪事件者非常惊愕，因为不存在没有伊尹的成汤时代的论点早在孔、墨显学知识背景中就已经成为共识。据此，我们或许有一个缝隙性推断空间，那就是，《列子》伪汤而不伪伊尹，非不能而乃不敢也，不敢的原因之一，或许因伊尹的形象具指的精密性及其符号指涉的知识自明性已经具有足够的真实自卫力量，而这无疑是神圣化同

^① 《韩非子·难言》

时也神秘化文化虚拟的历代帝王所无法坚守的,成汤当然也不会例外。

自汉儒劝上“独尊儒术”以降^①,至清末民初皮锡瑞坚守“孔子以前,不得有经”^②,其间不断地盛行着三代不可考以及仓颉不可信的知识学命题,由是而至“非孔子不足以开创中国思想文化之光”的意识形态文明观。这种观念不仅因利益合谋的内在需要而形成权力表达的“章帝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③,而且也压迫出知识分子知识叙事的“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的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④,无论是权利表达还是知识叙事,其趣皆在于营造“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中国思想文化氛围。

居此氛围之下,前孔子时代的知识虚无主义与文化蛮荒意识就具有最厚重丰沃的社会土壤。出人意料的是,自安阳殷墟龟背甲骨出世,甚至从前被知识制度不屑一顾的《山海经》之类的荒诞渲染中也不乏确证出真实清晰的早期华夏文明记忆^⑤,于是也就有罗振玉、王国维等一批知识精英,

①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据此,则儒家思想史至少可以切分为两个阶段,即从孔子开始的“原儒时代”和从董仲舒开始的“术儒时代”,其间校蔓又当别说。

②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页。

③ (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五《祀孔子》

④ 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

⑤ 王国维不无感叹地说:“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率先发动重审中国思想文化历史进程的“知识学转向”运动^①,其与新思想运动的交汇则是这些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立场者根本始料不及。当王国维欣喜地确证“商初叶诸帝,如大丁,如大甲,如大庚,如大戊,皆冠以大字,则汤自当称大乙。又卜辞曰‘癸巳贞:又于伊,其大乙彤日’”(《后编》卷上第二十二页)。又曰“癸酉卜贞大乙伊其(同上页)。伊即伊尹,以大乙与伊尹并言,尤大乙即天乙之证也”^②,不仅能够获得其所需要的证据效果,而且也能够获得此议的深层逻辑关系,即伊尹在有商一代的政治权利和文化影响力,已经达到足以与成汤同享烝尝的祭祀神地位,而这也就从根本上确立起诸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③的事实合法性,甚至包括几近极限情况的“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④。也就是说,伊尹作为文化意象存在以及体现这种存在的符号影响力,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与空间界限,在漫长的先秦时代成为普适并且普议的公共偶像,除了其在经典文本中智性表达的元话语思想价值与知识意义外,还在于杰出行为中智性表达的国家驾驭能力与社会塑造业绩,甚至其统一性,乃箕子、周公、管仲、孔子、墨子、老子以及一大批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或社会治理的精英们皆不能及,是以荀子

① 这一运动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活力量和知识支持维度。像任何一次社会运动一样,“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过激理所当然,而其知识浮躁的理性重估亦十分必要。“五四”的成就在于颠覆“三座大山”之“封建主义”合谋力量的术儒意识形态思想体系,而其不足则在于对原儒知识谱系及其经学知识史的简单否定,今天的新国学热则又走到越过知识理性边界的术儒意识形态招摇撞骗的歧途,历史有时演绎得极具相声效果,于喜剧形式中掩藏着悲剧意味。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③ 《尚书·伊训》

④ 《尚书·太甲上》

总结为“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是人臣之论也，吉凶贤不肖之极也。必谨志之而慎自为择取焉，足以稽矣”^①。

现在的问题在于，伊尹的历史地位及其实际影响，从前能从诸子百家文献的广泛流露中见出，殷墟考古事件以后则由甲骨卜辞进一步获得确证，剩下的就是古文尚书中伊尹诸篇究竟是否本人的原作，而这也形成今古文之争以来今文学派频生纠缠的最重要抓手。然而，事态的诡秘处恰恰就在于，今文派摈斥诸篇，多系“坏孔壁”而来，即所谓“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声，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②，又所谓“《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③。于是，“未列于学官”就成为否定其真实性的基本判断尺度，而孔安国歿于“蛊惑事”之先因而不可能存在献书之事，也就成为诸篇不可信的重要逻辑前提。站在我们今天的审视立场，不仅对伊尹文化意象于先秦时代的普在影响构不成颠覆性威胁，而且即使从知识证据维度也难以形成对今文学派否定性结论的认同。一方面在中国兵匪文化极限

① 《荀子·臣道》。孔子多圣言，而其行则往往大乖，至如所谓“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不拾遗，器不雕伪”（魏王肃注《孔子家语·相鲁》），家语耳，笑语耳。

②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自古迄今，术儒皆趋重今学与权力合谋的意识形态立场，当这种立场出现知识缝隙甚至摩擦之际，他们会连原儒的知识精神及其陈述真相也一起抛弃。

③ 《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所谓“逸者，即孔壁书也。康成虽云受书于张恭祖，然其‘书赞’曰：‘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亦好此学，则其渊源于安国明矣。今晚出书与郑名目互异，其果安国之旧耶’！逻辑不严密。

表现的“秦燔”烈焰之后,就连今文学派肯定的如伏胜之《尚书大传》,也还存在“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齐、鲁之间”^①的增补空间,断无伏生壁藏可信而孔子壁藏反而不可信的道理,这至少不符合历来坚信孔子删《书》术儒之论的一贯知识史立场;另一方面,在术儒们极积推动官方“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之下,不仅对诸子百家的多元文化传统实施其较“秦燔”更为致命的知识本体围剿,导致诸多先秦典籍出现比焚烧更为彻底的文本遁迹与思想消亡,而且对原儒富有自由知识品格的拟定性典籍蓄意篡改,其外部景观有如“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门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②,而其内中真委则全在于“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③。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未必有汉一代就不存在文本乐观状态的诸如“河间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书,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采礼乐古事”^④,因为酷秦之际知识分子们会有悲壮抵抗的“孔安国曰:‘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书于屋壁’”^⑤,或者“陈馥谓子鱼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矣。’子鱼曰:‘顾有可惧者,必或求天下之书焚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伏生传》

② (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十二《经学》

③ 汉高祖十一年诏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⑤ (汉)孔安国:《尚书序》,引自清孙楷《秦会要》卷十《学校·禁书》